



從經濟開放到政治壓制的 中國改革

陳坤耀著

梁潔芬譯

背景

過去十年，中國進行了多項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上史無前例之改革，而進入一名副其實的經濟開放時代；鼓勵對外聯繫；在很多地區和產業環節以市場經濟去分配資源，及推行私有制；經濟決策權紛紛下放，地方政府在對外貿易和外商投資及資金運用等重大問題上能有權靈活處理。一九七九至八四年間，一般農民都笑逐顏開，因為這時期的農產品收成率增長得相當迅速。在一九五三年至八四年間，全國農產品價值的增長率為百分之五左右，而在一九七九至八四年間超過百分之十，同時農村工

業及副產品使農民的收入大為增加。職是之故，當時中國便能吸引可觀的外國資金，去投入基本建設及製造工業上。外國的投資不但使國家收入大增，而且標誌着中國逐漸的成爲世界經濟系統的一部份。

在一九八四年末，當中國決定施行在農業的改革伸延至城鎮及工業上時，現代化及經濟改革的問題馬上湧現。一般而言，這些問題之滋生是當局對城鎮及工業改革先決條件缺乏認識，所以結果就是貿易逆差的出現，政府的稅收及開支不平衡日益嚴重，原料與能源調配不週，以致出現經濟過熱及嚴重的通貨膨脹，這種情形每況愈下，以致中國領導人於一九八八年重新評估經濟改革的取向及步伐。

在中國的高層領導人間曾掀起一場激辯，是否以陳云、李鵬及姚依林爲首的保守派方案應代替鄧小平和趙紫陽爲代表的改革方案。所以保守與改革二派的分歧加深，而兩派之間的權力鬥爭日趨凌厲。由李鵬被派去代替趙紫陽當黨書記之職一事可知保守派漸佔上風。經濟上的混亂、政治上的不滿以及社會上的不公義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不滿，而不滿之情在學生及知識份子間表現得最爲尖銳。胡耀邦之死爲學生運動提供一個機緣，引致學生在一九八九年四月至六月間佔據天安門廣場。然而六四鎮壓的導火線是改革派及保守派的權力鬥爭，而非出於學生的抗議。我們有理由相信學運的初期是由學生自發，但到後期一定有改革派人士從旁煽風點火，因爲改革派以爲，如果學生對保守派政策攻擊，便會有利自己重獲正在旁落的領導權。然而結果就是：保守派被迫運用武力去中止學生運動，而在改革派手上奪權。我們所稱的改革派及保守派是兩個相對的名詞，這裡所稱的保守派並非全部反對改革，不過他

們要求放緩改革步伐，堅持社會主義的國有制，壓縮市場經濟，收縮私有制。概而言之，保守派中人多半是留蘇份子，而被稱爲史太林派，他們主張中央計劃經濟。本文試將直接引致學生運動的經濟政治及社會因素予以分析。

問題癥結

雖然農業產值在一九七九至八四年間會有大幅度的增長，但這是剛引進責任承包制及提高糧食收購價時的一度表現。責任承包制使農民完成上交項目後，有額外收入，因而誘導他們比以前更爲辛勤勞動。大幅度提高收購農產品價格是刺激他們生產農作物的因由。但這種增產應是短暫性的，因爲根本上農業技術沒有基本的改進。而農民的儲蓄卻大部分花在附近的城鎮經濟活動及鄉村的企業上，所以雖然農民的個人收入增加了，但再投資在農業的比例卻很低，在基本的農業技術和農業基本建設沒有獲得改良下，人們預期農產品的升幅會停止。果

然，在一九八四年糧食創下了年產四百零七噸的高峰後，產額就每年遞減。

當農業生長停滯不前，照理中國應將施諸農業的改革，加諸工業，於是在一九八五中國在城鎮及工業上進行改革。當時的改革派未預料到城鎮與鄉村的情況大不相同。首先，作為改革阻力的「官僚主義」在城鎮遠比在農村龐大。還有城市企業中潛存的既得利益遠比農業為多。最重要的是，若依「企業自主」及強調「市場調節」的取向而進行企業改革的話，這種改革需要一些先決條件。其中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有一個能提供給買家及賣家自由進出的市場環境。這樣就等於以私有制和個體戶為主。但在改革過程中，這條條件幾乎尚未達到成熟地步，很多時，私有化或放鬆價格限制，造成企業壟斷和獨謀私利。再者，成功的城市企業改革要求各因素的高度流動性，好使產品能依供求之情況而變動。不幸，原料市場遠不如產品市場的改革程度，兼且因資金市場不發達與及城市工人的流動性受限

制，還有甚者，主要原材供應仍操在國營壟斷手中。只有與他們交上良好關係，才能獲得原料及產品的充足供應，加上中國資訊市場弊病叢生，所以市場消息五花八門，資訊傳播緩慢，因此順應市場需求轉變的回應也極為緩慢。

提高工資及獎金是彌補工人不斷上升的生活指數，以及刺激他們生產意願的方法，但多發工資就需要在政府預算案中吸取資源，這資源多來自借貸或多印鈔票。所以，由於提高工資及農產品價格而致使物價提升。還有由於企業改革引起的物價改革，最後導致百物騰貴。中國過去三十年來壓抑物價，物價改革必然帶來高度通漲。中國沒有宏觀經濟政策去利用收緊銀根以壓縮經濟，也無其他良方妙策以阻止通漲的惡性循環。

在中國還有其他導致通漲的因素，首先是人民幣的匯率太高而導致消費品及資本財入口大增。其次，中國政府的經濟權力下放政策，致令地方政府把賺來的大部份外匯留在身邊，這就造成嚴重「區

域主義」或「山頭主義」，以致國內的區域間互相貿易交往稀疏；由於缺乏專業技能致使產品的效能及生產總值降低。所以一九八八年時的中國，無論在市場經濟體系或中央策劃經濟體系上，都有行不通之現象。改革派未先建起一個城鎮企業改革的基礎，就動手摘除藉中央策劃而分配原料的傳統有效控制。因此中國成了社會主義制度及資本主義制度的最理想的混合體，而中國亦可算是集兩種制度流弊於一身，成爲「無制度」的制度。難怪任何人都察覺到，中國在一九八八年初陷於嚴重危機，需要制訂一條新路向。從回顧所得，我們得承認，鄧、趙及其他改革派人士在推行改革時，也犯了嚴重的錯誤，成爲保守派嚴重攻擊他們的原因。而經濟混亂給保守派十足理由把改革派拉下台。不過，改革派在過去多年中，在全國各地已豎立了勢力，兩派在強大阻力當前之際，需要各盡所能去克服對方的勢力，若從此角度看，不難理解爲何處理六四問題要運用這麼偌大軍隊。改革派有學生及民衆支持，

而保守派則擁有更大軍權。

在經濟混亂之外，還加上步伐蹣跚的政治改革，使曾在開放時間受西方思想影響的知識份子大感不滿，其實中國的知識份子絕非想把中國共產黨拉下台，他們只希望黨內產生一些民主體制。很多人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只是指行政體制方面的改革，因爲經濟機會使共產黨內及公務員制度內產生嚴重貪污及徇私的現象。知識份子們從來沒有要求過像西方政治下的多黨制，只是對政府的貪污痛心疾首。存在政府低層內的貪污還可以勉強忍受，若高領導階層也是如此不清不廉，難怪他們對此忍無可忍。一九八六年初的學生抗議行動能輕而易舉地被壓下來，因爲當時學生運動羽翼未豐，而政府內的貪污及經濟混亂也未算太嚴重。

在解釋八九年四月至六月學生抗議爆發時，一些社會因素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國社會中，無論在區域性的橫切面上或在同一地區的縱切面上，不同職業類型人士間的收入差異，正顯著地擴大。

似乎個體戶是這次經濟改革的受益者；相對而言，一般靠工資收入維生而從事服務行業的，特別是公務員及教育界，則未沾經濟改革之益以前已先受其害。入息不平均問題在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嚴重，因為它沒有重新調整收入的方法及尺度，在稅制上漏洞百出，逃稅瞞稅之風廣為流傳，徵稅制度並不基於付稅能力原則。同時，中國也沒有任何完善的福利制度去保障失業人士和收入低微的人士。

教育開支極為不足一事，可稱為中國政府施政上的一項嚴重失誤，因為中國政府倚重私人辦教育事業。其實，人力投資是推動日後長遠經濟增長發展的一項最重要政策。青年人接受教育的回報率很底，因而求學意慾不高，即使在譽滿全國的最高學府亦是如此。從事學術工作者及當教師的羞人入息，使他們士氣低落。難怪知識份子為何對政府的政策非常不滿，而在學生運動中他們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

從經濟混亂，以及知識份子和一些群眾對社會政治的不滿的角度去看，學生運動和佔據天安門廣

場之舉，一點也不足為奇。從不同政見領導人間的權力鬥爭的層面去看，保守派以強硬手法去結束整個事件也同樣的不足為怪。

遠景前瞻

趙紫陽之掛冠和學生運動之被鎮壓，意味着由陳雲領導保守派的一項重大勝利。其實，在整個事件中鄧小平成為最大的輸家。鄧雖是中國改革的主要策劃人和改革派的領袖，他在黨、政、軍三方面擁有最高聲望和勢力，但可惜他親手選拔的兩名繼承人及助手也相繼被消除。很可能在學運風頭火勢之時，他被誤導，而同意以武力鎮壓，所以有人傳聞說鄧小平對武力鎮壓有些後悔，這點不足為奇。以前鄧小平能奇蹟地在三次被整後重執政權。但可惜經此一役，他自己辛苦營造的英雄形象就一落千丈。

在未來的三兩年間，中國的政局在充滿暗湧之中還有穩定的局面，這是說，在未來的兩三年中，

中國現政權仍然高據統治的寶座。但長遠來看，可能爆發另一場危機。現在，真正掌管中國政權的是八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這八老之中，七名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換句話說，在最高領導階層的權力平衡遊戲中，鄧小平是以一敵七，所以有人認為鄧小平一日尚在人間，以他的聲望尚可制衡其他七人的權力。若改革派在養生休息後重振旗鼓，贏得軍隊及人民的支持，他們會捲土重來，可能再掀起另一場權力的角力賽。什麼時候這場鬥爭再揭起呢？要看那八者何時逝世而定；現在陳雲及鄧小平二人的健康均走下坡，其餘保守派人士仍然健碩異常，所以有人估計保守派至少在兩三年內不會失勢。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共產黨的制度及中國的政治組織不變的話，在中國政壇上的這種權力鬥爭和領導的輪流更替是無可避免之事。黨內的權力鬥爭進入到不能妥協的地步時，政治混亂會隨即發生。所以中國難有長時期的政治穩定。在中國共產政制下的權力鬥爭十分嚴酷，輸家一方不但喪失政治權

力，而且家庭同黨亦會被連累。除非中國的政治組織產生基本的變化，不會因現政權領袖被替換便出現長期的政治穩定。

在經濟方面，中國的現政權將會把門戶大開，歡迎外商投資和國際貿易。經過以往幾年的混亂後，中國需要今後在經濟的增長抓點成績，尤甚者在今後三兩年間，中國要面臨外債的還款高峰期，所以它對外匯需求更殷。因為在外商的心目中，中國的投資風險已經增大，所以外商很難對中國的投資保持以往的熱衷。當投資一旦已經開始，外商當然會持續下去，以待完成。但在短暫的將來，恐怕不會有新的投資。在開發得最多的沿海城市內，以往全是趙紫陽派系人馬的領導人，不久他們會被調換下馬。接替者當然是比較保守及謹慎處理對外經濟關係的人士為主。

其實，對中國的經濟前景人們不抱過度樂觀態度，因為中國在資金及人才供應上將要面臨非常嚴峻的問題。經過鎮壓學運及知識份子後，中國已流

失了一大批現代化不可或缺的稀有**人力資源**。現正有超過十萬中國學生及學者滯留海外，當現政權一日尚存，其中甚少有賦歸之意。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極難填補這些技術方面的空缺。

在私有制及資源的分配的問題上，毫無疑問，中國會扭轉到公有制及中央計劃上，重新強調國營企業的重要性，把從前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權力收回。短期內，中國會轉回中央計劃經濟，從前因缺乏中央監管的市場經濟所產生的混亂會消失，而中國的經濟過熱及通貨膨脹的情況亦會改善。不過，在長遠計，這樣的轉回中央計劃制度，不能刺激農業和工業的生產積極性，也許物價沒有過去數年般飛漲。但以供應服務不足和不能滿足現階段的消費需求的方法去壓抑通漲的情況，將會持續下去。

中國的經濟問題既衆多又複雜，不能單靠史太林式的高度集中經濟，或在一定階段內過簡的市場開放經濟，把中國經濟搞活。下列一連串按步就班的制度上及經濟上的改革是中國應該實施的：

一、在公務員制度上，從中央階層至地方階層實施行政改革；

二、將集體及國營企業私有化生產將因素的市場自由化，俾能製造一個充滿競爭性的微觀經濟環境，讓市場力量得以發揮。

三、建立金融機構及組織，以及落實金融改革，使中央及地方政府能對宏觀經濟作有效的控制；

四、引進市場經濟及價格改革去分配資源。

五、政治改革。

在物價改革前，一些重要的準備工作必須先行完成，而且行政改革也是重要的一環。跟着，朝向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應慢一步進行。在中國過去十年的開放政策及開放市場的經驗上可供學習者，俯拾皆是，若中國領導人能下決心去改正錯誤，必為時未晚。